

中山文史资料目录

前言	黄联安	1
大革命时期我党领导下的学运		
史料一束	徐 聆 魏 芸	5
记中山新学生社	黄云苏	10
“四·三”农工起义纪略	马庾庵	14
“中山抗先”从建立到被“停止活动”	芷 轸	22
滨海区民主建政拉杂谈	欧曼宽	36
滨海区沿革	芷 轸	41
温婢之家	甘 雨	42
介绍一个交通站	何金荣	48
杨殷传（转载）	冯铁东 史 莘	50
广州起义香山一兵	何季饴	56
缅怀陈衡葆老师	程智民	59
我邑早期的革命家刘师复	刘 杰	61
人 思复先生传略（1884—1915年）	何文广	67
我所认识的郑彼岸先生	肖 嘉	72
黄冷观传略	甄振进	74
和舅公钟师荣光相处的时候	卢竹荣	79
老兴中会员李就一生	卢新贡	90
孙中山少年时的业师程君海先生	梁耀中	92
物 抚今追昔忆人定（转载）	杨荫芳	95
记彭炳纲师	余菊庵	98
昨日的球星孙乾（转载）	余 航	100
荣高棠同志在中山	黄联安	102
爱国华侨、商界巨子马应彪	华 键	105

篇	爱国爱乡的马应彪	李未泯	109
	“永安”创始人郭氏家族	迪 华	111
	郭乐小传（转载）	周寿臣	114
	名扬海外念切乡邦的林思聪	何仰镛	117
宦绩新篇	缅怀家父郑道实	亚 倪	119
	杨子毅当中山县长的时候	振 兴	135
	杨子毅传略	杨复兴	142
	立志实业救国的程天斗	程澍经	144
我也谈谈爱国诗人何巩道		梁志钧	146
何越巢是否爱国诗人？		李炳芬	150
《香山诗略》简介		淋 涓	151
《香山诗略》续篇（有序）		何文广	157
抗战期间民办刊物几种		振 兴 郑柏侣	171
吊蒲鱼洋万人坟（诗）		春 野	177
北隅烈女行（有序）		李 浩	179
“西樵惨案”始末		简子尧	181
香山立县与陈天觉		高民川	186
三十年代中山排球活动一瞥		李旭超	188
长洲行		柏 盈	192
香山县志知多少？（县志摘抄二）		凌 辑	194
读史小议		卓頌嫻	195
读者·作者·编者			198
稿约			208
补白：郑道实遗墨 ^{（一）}			149
补白：郑道实遗墨 ^{（二）}			176

前

言

黄联安

在市政协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工作意见中，曾提出要贯彻省政协关于做好文史工作的决定，注意征集编写华侨和港澳知名人士或同乡会、社团等有关史料，更好地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为此，我们在这一期中，根据上述决定，曾经组织人力，征集和编写了沙涌马氏家族和竹秀园郭氏家族的事迹和发家史。他们以华侨之身，怀着赤子之心，不甘心祖国的贫困，以独有的魄力和才干，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创办了省港澳驰名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他们为振兴中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精神和宝贵经验，对于今天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四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是一切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华侨和港澳同胞历来有爱祖国爱家乡的优良传统。马、郭两家族，不仅具有振兴民族工商的热情，而且对家乡建设也不遗余力。马氏在沙涌乡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先施学校，郭家的后代郭棣活先生也慨捐巨款，资助兴办我市华侨中学。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中山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影响和倡导下，涌现了不少爱国志士和可歌可泣的英烈事迹。这一期发表了杨殷、刘师复的革命事迹，可以从这些侧面中，反映了老一辈的革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的自

我牺牲精神。从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中，杨殷则是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他原是孙中山的副官，但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被选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军事部长。孙中山的晚年，顺应世界潮流的发展，把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可见，他在历史的接力跑中，已经跑完了民主革命的赛程，遗憾的是在转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赛程中，不久，他不幸去世了。而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批老革命家，则是接过孙中山的接力棒跑完了这一赛程的继承者。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通过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在反动的统治者的统治下，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而这些有志之士，却起来反侵略、反压迫，争取民主和解放，他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这些，都是有血有肉的爱国主义教材，它将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到四化建设、统一祖国的伟大斗争中来。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写道：“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这些史料都是很可贵的。

我们的祖国具有几千年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批判还是继承，都有待进一步去整理和发扬。旧的一代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我们这里发表了郑彼岸、郑道

实、黄冷观、彭炳纲、钟荣光……的事迹，既可看到他们的贡献，也可看到他们走的道路，他们虽然出身各异，信仰不同，但都具有高尚的情操，光明正大，为后世所钦敬。

这里，我们还发表了几篇体育方面的史料，一篇是转载《体育报》的《昨日的球星孙乾》，一篇是《三十年代中山排球活动一瞥》，另一篇则是《回忆荣高棠同志在中山》。上了年纪的人，都不难回忆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被讥讽为“东亚病夫”的耻辱。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指引下，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人才辈出。今年，我国体育健儿在23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充分地说明这点。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跃上了体育强国的行列呢？外国报刊有少评论，但是，日本《产经周刊》的评价是较为中肯的。他们说中国建立了无一遗漏地把分散在地方的优秀苗子吸收到中央来的体制，以及国家关心运动员是中国体育强国起来的最大秘密。从荣高棠在中山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体委领导人，是如何关心地方的体育运动的。当他年纪老了，在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还担当我国参加奥运会体育代表团的顾问。日本《产经周刊》的论证，确是有根有据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旧中国体育的落后，并非我们中国人天生是弱者，《昨日的球星孙乾》不是有力的说明吗？主要的，是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尽管孙乾在球坛中喧赫一时，也不外是昙花一现而已。

我们今天转载孙乾的这段历史，还在于鼓励后来者，只要有为国争光之心，刻苦锻炼，一定会取得成效的。

中山抗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组织，也是我党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它肩负着抗

日救亡的重任，成为珠江三角洲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进步的旗帜。这部分史料，本来是属于党史研究室征集的，但根据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决定，仍可由政协文史组征集出版。

征集史料的下限，也是要弄清楚的。过去我们曾提到是由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将文史资料的征集下限改为“文化大革命”以前，因此，在五十年代至“文革”前这段期间，仍属征集范围。这段时间，资料是不少的，希望大家行动起来，通过亲友、同志，积极征集和编写，共同办好这一刊物。

最后，我们再一次奉告和寄望我们的全体政协委员：我们这个刊物，固然不妨说是属于我们中山全体市民的，更其应该说是属于关系尤为密切的我们全体政协委员的。关心它、爱护它，积极扶植它，实在是我们全体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除对于市政协副主席黄华键和委员余菊庵、刘杰等同志为这一辑积极撰稿、深表欢迎之外，我们特别吁请委员们给予本刊力所能及的支持，提供稿件，寄赠资料！我们不少委员年事已高，阅历丰富，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和各式各样的斗争生活，只要肯动脑筋，动笔墨，一定是写得出很多很多有价值的材料来，这对乡邦文献，将是何等可贵的贡献，对我们的工作，将是何等可贵的推动力啊！

大革命时期

我党领导下的学运史料一束

徐 聆 魏 芸

大革命时期，我区学生运动是革命史料中占重要篇幅的。忝为当年的革命学生的一员，我虽德薄能鲜，脑瘦肠枯，仍愿正视历史赋予的责任，发挥余光余热，尽记忆所及，从二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一块既闻琅琅书声、也见刀光剑影的战场上，检拾一些碎料，备编史者参考或采用。

当年的学生运动是以学校内的“学生自治会”为基地的；而举起革命火炬的则是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并有党的领导（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中学生。当时设在石岐的县立中等学校有“中山县立中学校”“中山县立师范”和“中山县立女子师范”三所；但革命力量主要在“县中”集中，“女师”的学生自治会也掌握在进步青年手中。“男师”就不同了。所以，工作上，前二者常采取统一步骤，后者则除个别学生与进步力量行动一致外，大体上或则不合作，或则唱反调。最可笑者，当时进行按规定是县中学生作先导，男师向后跟，但男师硬要“扒头”，往往造成一阵纷扰。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进一步发动进步力量组织“中山县新学生社”，作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以及作为团结广大青年，领导学生运动的中坚。除县城内各中学之外，区上中学（如小榄中学）和私校（如竞修学校）也都有学生参加，县

中学生是主要的领导力量。

由于学生与工农群众的紧密结合，构成更巨大的组织力量，树立了更高的威信，新学生社曾于1926年在县中礼堂召开过一次有二百多名学生参加的学生代表大会。会议的结果是原有的全县学生联合会得到整顿和充实，各校的学生自治会也进行了改组，这就给革命队伍树立了优势，壮大了力量。

县城之西有个称为“大较场”的地方，清代是讲武堂，历来统治者用作刑场。开全县运动会时又用作健儿们竞技所在，向为公产，占地二三十亩。1924年秋，县长林警魂（当他还以大涌为其“领地”充当土匪头目的时候，曾率众匪洗劫石岐，商户被抢一空，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行将去职，为满足其刮地皮的贪欲，竟公然下令开投此地。革命学生闻讯，即在行将开投的紧要时刻，由刘广生、黄如城、孙艺文等多人，带领群众千余，冲入县府，找林警魂交涉。林不敢露面，秘书郑少一悄悄溜走，县兵们则架起机枪，对看学生群众，准备开火。情势危急，问题无法解决。学生们却毫不惧怕，一面派人到各处调动援兵，一面占住衙门，晚上仍露宿不走。翌日，由即将接任县长的卢家驹前来调停，答允停止开投，保留公产。这一斗争便胜利结束，群众无不称快。

在学生行动前，县中校长张丕基（清进士，曾任修志官）曾说过学生们是“不畏强暴”并同意“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张不是开明士绅，但赞许青年人的“暴力”，值得在这则史料中添上这一笔。

在改组学生自治会的同时，县中和女师都组织了“择师委员会”和“膳宿管理委员会”。用后来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来说，这些（特别是“择师”）说得上是道地的“新生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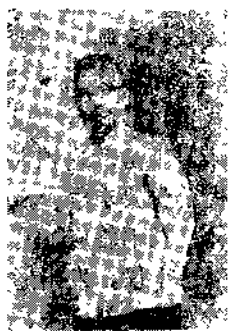
学生运动是接受了“五·四”的优良传统、高举“反帝

反封建”旗帜的。但学生们并非只闹革命放弃学习，有如那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人所诋毁的那样。当时的革命学生特别是负领导责任的学生，往往是学习尖子（刘广生烈士尤为突出！他在百忙中手不释卷，宿舍熄灯后常在路灯下读书）。不过，在革命斗争如此尖锐、如此急剧的岁月，校园内是能保持气氛的静宁，秩序的正常，1926年县中是林简当校长，女师是李金英当校长，男师是邝占熊当校长，他们都是不同意甚至反对学生运动的。有个别教员，或则具有政治背景，满脑反动思想；或则皈依“我主”基督，满身洋奴臭味，于是，这种人便在择师运动中成为革命对象了。县中学生首先要求学校撤换物理教员何澍昌（注意，不是何世昌），林校长不答应，乃进行罢课，持续几半年之久，学校便采取强暴手段，发出通告开除所谓为首滋事学生十二名（他们是黄如城、刘广生、孙艺文、黄直之、刘梓材、赖壮怀、杨展鹏、黄文枢等）（注2），从而引起轩然大波，斗争更加激烈。学生自治会主席甘卓环受命赴省，向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请愿。省党部即致函县教育局（当时局长已由陈挺恺换为伍敏修）。请飭县中当局撤销开除学生的错误决定，以免风波扩大。但林简坚持“学生返校必须不搞运动”这个条件，问题仍未能解决，学生继续上省据理力争，使得省党部要派出青年部长黎樾庭和学生总会主席郭寿华亲自来岐，向伍敏修交涉。结果，在革命力量的威力下，教育局和学校不得不让步，恢复被迫离校学生的学籍，赶走教员何澍昌，林简随而引咎辞职，伍敏修向全校学生讲了话，斗争宣告胜利，事件也就结束。

与此同时，择师运动也在女师激烈开展了。当时校内有个社会学教员张志超（不是张士钊），被认为“国家主义派”，

言论反动，引起革命学生的不满，开大会批评他。该校校长竟向县兵大队长高胜湖搬兵来校弹压，学生自治会早有准备，即由该会主持人李慕瀛急电农协派出农军来校支援。结果县兵被迫离去，事后张志超自知没趣，也不得不自动辞退。

在择师运动浪潮冲击下，县中还有一个教员被赶走。他叫陈沛基是训育主任，兼教体育。此人大言不惭，实其不学无术；加之语言粗秽，生活腐化（臂上常戴一只金钏），早已招致学生不满。有一次查悉陈到澳门嫖妓、赌博，更引起学生强烈反对，择师委员会根据学生意见，作出决议并贴出布告，限陈于廿四小时内离校。那时的校长是缪恭煦，他与学生步调较一致，也就同意陈沛基引咎辞职了。



刘广生遗像

县立中学尽管长期实施与国民党统治相适应的教育，甚至是洋奴教育，法西斯教育，但在历史巨轮滚滚向前之际，它，在所有学校当中，突出地成为一代新人的摇篮，成为革命思想的策源地。这是从成为学堂开始迄今将已八十高龄的老校的光荣！（听说有人竟然提出要把它改用一个私人的名字，不知何所用心！）县中还有一桩历史是值得骄傲的，那就是，学校当时不仅有共青团、学生自治会，而且有一个革命化的国民党支部——十三区分部。这个区分部的领导成员，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青团员。那时搞的革命活动，经常也用的是区分部名义。特别是在省党部派了特派员黄县如来当训育主任（陈沛基走后）之后，党务发展了，

《国际歌》从校内唱到校外了。（这是孙中山的故乡破天荒第一次传播这支歌。值得大书特书！）歌是由黄县如亲自教唱的。“英特尔拉雄纳尔”一词，当时未有中译，还是用英文来唱的。后来见歌词原有三首，但当时只教唱了一首。

“五卅”和“六·二三”两个惨案发生之后，全国爱国群众义愤填膺，敌忾同仇，纷纷进行抵抗和“杯葛”。新学生社大声疾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者，号召青年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投身革命斗争。“救亡团”、“济难会”等组织乘时而起，宣传队募捐队，应运而生。“抵制劣货（即日本货）”的口号，顿时化为爱国群众（特别是爱国商人）的热血行动。设在石岐的商店凡有日货的，或烧毁，或封存；居民惯用日货的也拒而不用，国货一时大为畅销。青年学生经常组织大巡行，有时更在夜间举行所谓“提灯大巡行”，唤起民众，宣传反帝，那时的巡行，常有化装队伍，有的扮成乌龟模样，头戴平顶草帽（那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日本货），称为“乌龟戴草帽”；有的扮成母猪，手拿阳伞（用日本布制成，也是来自日本），称为“猪母担阳遮”。这样化装，非常引人注目，宣传效果很好。当时看过巡行的人，至今记忆犹新。

中山县新学生社设在县中东走不远的东岳庙（即现石岐孙文东路七星初地街口左侧这块旧址，已于十多年前夷为平地，改建为居民住宅）。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的革命文物。因为大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新学生社”、“救亡团”、“济难会”，以至后来办的夜校，（县中学生郑豪、何飞云、方悌庸、郑云开等人都在这里教过他学生）都用了这个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部的队址也是这个地方。这是留下了很深很深的革命脚印的纪念！

1926年暑假后开学不久，县中招收了六位女学生，插入当时的第二十班读书。她们是叶竞秋、康碧云、杨淑英、余德慧、刘×芬和×××。这在县中的招生历史上是创举（在此之前，县中从没招收过女生）。她们入学后都或多或少地参加革命活动，给校史、甚至是学生运动史添上可贵的一页。其中尤以叶竞秋，当时已经做了母亲，丈夫在香港做工，她自己在入学期间，赶上时代，对革命作出了贡献。革命进入低潮，她也跟一些进步学生一样，离开学校，后来去了香港，有些同学投奔她，她也尽可能给他们以保护和资助。

（注1）孙艺文，当时也叫孙一艺，即孙康。

（注2）被开除的学生当中，似乎还有马庚庵、邱炳森、刘钦韶等几个名字，确否尚待查证。

记中山县新学生社

黄云苏

处于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五年九月，广州新学生社中山支部成立，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掩护体（今日的术语是“外围组织”），嗣因各县团组织蓬勃发展，基于革命需要，一九二六年就向中国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具有国共合作性质）申请登记，成为新学生社，次第建立中山、五华、东莞等县分社；团组织亦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同时以新学生社××县分社作为掩护体。中山县分社，经过调整，并取得中央青年部同意，由部长丁维汾致函中山县长

许霖，请予协助发展组织；从此新学生社在中山便成为合法的青年组织，得以在附城各校及各乡获得顺利进展。这固有其本身的鼓动宣传力量，亦未尝不由于具有县政当局的默认（等于支持）这一积极因素。

一九二五年八月和一九二六年三月，新学生曾分别召开过社员大会两次，社员人数由组织开始时三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五十余人，先后建立县立中学、县立女子师范及恒美、张家边、白石、神湾、树涌、北澳、马溪等乡支部，也使共青团组织同时获得发展。各县分社，都采取民主集中的执行委员会制，集体领导，社章规定每年召开社员大会一次，并规定：“社员一百人以上的分社，可以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七至九人，互选主任一人，书记一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由主任和书记负责日常工作。惟第一届执委自一九二五年八月选出，迄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时仅半年，因情况变化，即于一九二六年三月提前开第二次社员大会，选举第二届执委。第二届执委会产生后，复因特殊原因，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九二七年一月两次由执委会决定调整负责常务的主任和书记，领导力量从而得到加强和巩固。当时负责常委的有下列人选：

第一届执委（25年8月至26年2月）刘广生、黄如诚、高宗濂、黎奋生、黄弥谦、李镇南和李杜。主任刘广生，书记高宗濂。

第二届执委（26年3月至27年4月）刘广生、黄如诚、黄弥谦、黎奋生、刘梓材、高宗濂、孙一艺、李镇南和马庚庵。主任黄弥谦，书记黄如诚。

26年7月至12月主任是刘广生，书记是黄弥谦。

27年1月主任是黄如诚，书记是刘梓材。

一九二六年七月新学生执委员会调整组织时，团总支召

开一次团员大会，改建县团委，结果由选举产生黄如诚、黄弥谦、高宗濂、黎奋生、马庚庵、刘梓材、李镇南七人为县团委，由上级党组织指定黄弥谦为书记。

中山县在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就有中共小组及共青团小组的建立，当时系以新学生社中山分社作掩护。新学生社在广州，原来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灵魂，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为共青团后，亦隐蔽在新学生社里，当时共青团在中山，也是一样做法，不过在中山更多一层任务，就是作为中共小组的外围，一切活动，都在党组织（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由新学生社出面公开进行。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党组织提出“农工学大联合”的号召下，由于新学生社成员多方鼓动和大力进行，结果，由中山农民协会、县总工会以及全县学生联合会，新学生社中山分社（县学联和新学生社，合为一单位参加）共三方，每方各派代表若干人，召开代表会议，产生执行委员二十七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三人，负责日常工作。中山县农工学协会组成了，常委由李华珪（县农协代表）冯光（县总工会代表）和黄弥谦（新学生社代表）三人负责。迨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党组织因鉴于环境变化，形势恶劣，一部份同志，必须转移阵地，遂调黄弥谦等落乡工作，农工学协会常委及县团委书记职务，均交刘梓材负责。当时全县学联会尚由刘梓材（县立中学）刘淑婉（县立女师）等主持，迨及“四·三”起义失败后，广州反动当局继于四月十五日发动所谓“清党运动”，中山县即由郑鸣鹄等组成中山县党部清党委员会，随即发表黄君泽、杨钧直等为全县学联会改组委员会委员。省党部同时又派何一戎、吴世楨、梁栋等为县农民协会改组委员会委员，进行反共布置。

当时出面主持改组学联的黄君泽、杨钧直两人，均系县立师范学生，早已露出反动面目。一九二六年，黄等代表县立师范出席第一次全县学生代表大会时，他们反对学习社会主义，嫉视共产党，对于一部分思想较幼稚的代表，多方进行欺骗恐吓，说共产主义好象洪水猛兽，接近不得。清党事发后，他们得遂其阴谋，并彻头尾地走向革命的反面。

一九二六年三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虽在国共合作时期，但中国国民党中山县党部，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落在反动派骨干老、郑少一、苏华、杜炳、林天椒等人手里，他们在群众团体中搞分裂，使“中山全县总工会”和“中山县工会联合会”对立起来，形成两个工人运动领导机构。全县学生联合会，亦有不团结现象，黄君泽、杨钧直等也早已从中造谣挑拨，大肆捣乱。只有“中山县农民协会”，在广东省农民协会领导下，始终团结在共产党周围，鉴于形势急剧变化，因此，于1926年3月间，成立中山县农工互助会，把一向在中山县总工会领导下的各个可靠单位，以及学联中的革命力量重新集结起来，加强对付反革命的进攻力量。但形势越来越恶劣了，上级领导有见及此，便在1926年3月至1926年12月，由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出何仿泉、叶毓年两同志到中山调整组织，发展新生力量，并组成四个特种委员会，即“组织宣传委员会”、“农工运动委员会”，“青年妇女运动委员会”和“商民运动委员会”，代行执行委员会职权，只留空头的常务委员领銜，处理日常事务。四特种委员会成员，完全是新学生社社员，（包括当时的中共党员在内）但是整理工作，尚未得到预期效果，局势恶化，四个特种委员会随之结束，新学生社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走上革命阶段。

“四·三”农工起义纪略

马虔庵

（一）农工起义的前奏

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尚未崩溃，中国国民党中山县执行委员会仍为反动派肖干老等所操纵，但当时在中共中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工农学大联合的号召下，农工学各单位的进步分子，已经依法建立起以李华炤、冯光、黄弥谦为常委的中山县农工学协会，开展工人运动，另组织新学生社的骨干分子，深入农村，宣传农工学政策，发展农协组织，积聚革命力量。中山县妇女解放协会也建立起来了。而在中山县党部的肖干老等人，仍一意孤行，坚持反革命立场，破坏统一战线，上级早已洞悉其阴谋，才于一九二六年四月，派来叶毓年、何仿泉两同志，运用温和的改组办法，架空县执行委员会，组成以叶毓年为主委的组织宣传委员会，以黄弥谦为主任委员的农工运动委员会，以李慕濂为主任委员的青年妇女运动委员会，以何仿泉为主任委员的商民运动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全是农工学协会骨干分子。而以上四个特种委员代行中山县党部执行委员会职权，只留原任常务委员一人处理日常工作。但形势恶劣日甚，革命力量活动困难，到了广东省党部改组之后，立即派出郑鸣鹤、孙恩沛、高克夷为中山县党部改组委员，成立改组委员，酝酿清党，于是一九二七年三月

以后，县上所有人民团体和一切进步分子，便均已在反动组织严密监视下，不能在石岐活动，必须转移阵地，而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农工学协会属下的各个组织，亦惟有加强联系，暗中活动。四月十五日广州清党事发，郑鸣鹤等被任为中山县清党委员会委员，实行清党。

先是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段时间，县属五区南屏乡，四区濠涌乡、一区树涌乡、长州乡，迭经多次发生土豪劣绅压迫农民事件，石岐地区工人复饱受贪官污吏和不法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痛苦难堪，曾经多次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均无结果。因此，大家都认识到革命如果找不到出路，便只有被毁灭，只有彻底失败。“来一次武装起义！”，便成为当时的急迫任务了。

（二）农工起义的发动

当迫近起义的前夕——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在中共地下党人刘广生、李华焰、黎炎孟等领导下的中山县农工学协会，曾任用中山县驳载工会的流动性民船一艘，开入长洲乡农田地区冲溜“带水河”停泊候命，指定同志秘密通知各单位，准备依时派出代表到船上开紧急会议，是日下午一时过后，县农协负责人及第一区、三区、得能都区、四大都区、第九区等农协代表，（当时第五、八区农协尚未成立，只有少数乡办）中山县学联及新学生社，均派代表出席会议，议决各方面武装力量，依时完成集中计划，准予四月五日起义。并发布“告中山县群众书”，会议还决定：由李华焰、黎炎孟、韦健、冯光、梁明贺、李斌、（原中山县驳载工会负责人）刘广生、黄如诚、黄弥谦等组成九人委员会，发布这篇告群众书时，称为“中山县农工革命行动委员会”还决定将各乡集中的农民自卫军，组成中山县农民自卫军集